

野生动物侵限的法律责任界分

环资判

◇ 胡玉明 许思妍

野生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如豹子、野猪、东北虎等,侵入高铁运行轨道及两侧安全保护区的线路限界(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侵限**),极易引发高铁运行事故。此类事故不仅严重危及乘客人身、财产安全和高铁运营秩序,也会导致野生动物伤亡,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有效防范野生动物侵限,是保障高铁运行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共同要求,而明确野生动物侵限法律责任,是以法治化方式预防和解决野生动物侵限问题的基础。

一、乘客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高铁是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范畴,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的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对损害一般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因野生动物侵限导致高铁发生事故,造成乘客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即使能证明自身无过错,如已尽最大合理防护义务,也需基于高度危险作业条款而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应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

如果遇有罕见的、无法预见的特大兽群迁徙,铁路运输企业能否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条以及铁路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主张不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若乘客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就列车晚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可适用“不可抗力”事由,认定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为,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迁徙,是每个公民的生态环境义务,由此所产生的等待时间是每个公民都需要承担的时间成本。若乘客以“铁路运输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和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则不宜适用“不可抗力”事由,而应基于高度危险作业归责事由,由铁路运输企业承担无过错责任。因为,当发生特大兽群迁徙时,铁路运输企业相较于乘客更有能力、有技术预防和避免事故发生,由其承担责任符合社会公众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

二、铁路运输企业损失的赔偿责任

对于铁路运输企业自身遭受的损失,如

列车及线路设备损坏、运输中断损失等,需要分析铁路运输企业、第三方责任主体在事件发生前、中、后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铁路运输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铁路运输企业,作为高速铁路的直接运营管理者,按照安全生产法、铁路法的相关规定,对铁路运输安全负有首要和直接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预防野生动物侵限,以及在发生野生动物侵限时及时妥善处置,最大限度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后果。具体而言,第一,物理防护。因地制宜建设脉冲电围栏、阻隔栅栏、隔离壕沟、植被隔离带等隔离防护设施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定期巡查、维护和及时修复,确保其完好有效;在关键区段,如已知迁徙路径、水源地附近,加装加固或升级防护设施。第二,监测预警。采取影像监测、振动光纤、红外感应、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建立有效的野生动物活动监测和预警系统。第三,驱离措施。在必要区域设置并合理使用声波、闪光、气味等驱离装置,并评估其效果及对野生动物的潜在负面影响。第四,环境管理。配合地方政府,清理线路保护区内外可能吸引野生动物的食物源(如垃圾堆、农作物残留)、水源和隐蔽场所(如过高灌木丛)。第五,巡查看护。加大线路巡查看护力度,特别是在野生动物活动高峰期,如晨昏、迁徙季节。第六,制度建设。制定完善的野生动物侵限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建立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第七,应急处置。监测到或接报野生动物侵限预警后,立即按照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如通知列车限速或停车、派员现场处置等。第八,及时报告。发生野生动物侵限事件(无论是否造成事故)后,按规定及时向铁路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报告情况。

2.第三方的审慎注意义务。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铁路建设、维护的施工单位,铁路沿线附近的生产经营单位等,应对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履行预见和避免义务。例如第三方的施工活动应避免破坏防护设施,应及时清理施工期间产生的垃圾,筑牢临时围挡;第三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应避免改变周围环境要素,避免产生吸引野生动物的因素,如气味、食物残渣、水源等。

3.铁路运输企业损失的分担。因自身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发生野生动物侵限事故的,铁路运输企业需自行承担相应损失。对于铁路运输企业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审查要点如下:是否采取了与其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相符的、合理的、行业认可的防范措施;防护设施的设计、建设、维护标准是否符合技术规范;监测预警系统是否有效运行;应急预案是否科学完备并得到执行;处置是否及时得当;报告是否及时准确等。

第三方存在主观过错,从而导致野生动物侵限事故发生,应向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第三方是否履行了审慎注意义务,审查要点包括其行为与野生动物侵限事件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违反了相关管理规定或合同约定。

三、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责任

近年来,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种群的快速恢复增长,使得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凸显。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即将施行的国家公园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公园区域内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和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依法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补偿。这一法定“补偿责任”,体现了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的法律责任。

2024年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度,依法推动制定、修订相关补偿办法,对采取预防、控制其他致害严重的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安排补偿所需经费,依照事权落实法定支出责任。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公园法也明确,地方政府采取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实行补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予以补助。

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责任是否适用于野生动物侵限造成的损失?笔者认为,可以适用。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的法律责任,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是否履行管理职责,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前者属于民法上的责任,后者属于行政法上的责任。铁路运输企业可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就野生动物侵限向事发地的地方政府就列车及线路设备损坏、运输中断等损失请求适当补偿。

四、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野生动物是一种重要的生态要素,对于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高铁运行安全需要采取的防护措施,如防护网、声光电驱离装置等,导致珍贵、濒危的陆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可能需要根据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具体而言,对于由高铁运营活动而产生的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的若干规定(试行)》等规定,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与损害生态环境的责任者(铁路运输企业)可先行磋商,对经磋商达成的赔偿协议,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磋商未达成一致的,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应当及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由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并由环境资源审判部门审理。

认定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时,应考量铁路运输企业的防护投入和防护效果,如能够证明其已经依法采取了必要的、合理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或者减少野生动物伤害,如符合标准的防护设施、有效的驱离手段、及时的应急处置,并尽到了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可酌情减轻其赔偿责任。特别是在,在野生动物侵限危及高铁乘客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因紧急避险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的,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五、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责任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法规,对辖区内野生动物资源、栖息地及生态环境负有保护和管理职责。同时,对铁路沿线的土地利用、规划建设活动负有监管职责,应支持并配合铁路运输企业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消除或减少吸引野生动物进入线路保护区的环境因素。

具体来说,主要涵盖五大方面的职责。第一,栖息地保护与管理职责。依法划定和管理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在高铁沿线相关区域采取科学的生态保护措施。第二,种群调控职责。对局部区域种群数量过大、对高铁运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非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评估并依法批准后,依程序采取种群调控措施。第三,环境治理职责。加强对高铁沿线保护区外侧的土地利用管理,及时清理垃圾,管理农业活动,减少人为因素吸引野生动物靠近高铁线路。第四,规划协调职责。在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中统筹考虑铁路安全与生态保护需求,预留生态廊道。第五,支持配合职责。与铁路运输企业共享野生动物活动信息、分布数据;支持铁路运输企业在轨道两侧安全保护区外侧开展必要的环境整治;联合开展巡查、宣传;在发生重大侵扰时,提供专业支援,如麻醉、转移等。

此外,在涉野生动物侵限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应根据主管部门的具体法定职责范围和实际履职情况,审查和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作者单位: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条线建立侵害商标权、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要素式审判辅助模型,法官反馈有帮助率最高达97%;上海法院商事条线首批立项“股权转让类”等3个场景矩阵,重点研发“委托调解司法确认的文书自动生成”等3个文书直接生成智能体、“自动送达缴纳诉讼费通知书”等2个审判流程管理类智能体,推动相关场景建设经验复制推广……

如今,类似这样的数字应用场景,上海法院已研发1800余个,形成“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五大核心板块,累计推送提示信息超过150万条,通过深挖司法大数据价值,加强与相关部门、机构数据协同共享,推动司法职能向“抓前端、治未病”延伸。

是先行者,也是领跑者,上海法院持续完善数字法院建设体系,离不开专业人才支撑。上海法院主动打破院校与实务壁垒,深耕法治人才协同培育。两年来,已与26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192份,全市法院236名优秀法官纳入“上海法院实务专家库”,相继聘任两批353名高校专家学者为上海法院特聘教授,整合三级法院教学资源在13家合作高校开设《刑事审判实践》等50余门学期制课程。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上海高院既是地缘相近的‘好邻居’,更是协同育人的‘好伙伴’。上海各级法院的法官走进我们的课堂,为凯原法学院的人才培养注入了实务教学的智力支撑与鲜活活力,也为学子们搭建了通往司法实践的坚实阶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彭诚信表示。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擘画的宏伟蓝图,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上海法院将继续紧扣“五个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审判领域改革,加速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以更精准的司法服务回应高质量发展需求,以更开放的司法姿态参与国际规则塑造,以更智慧的司法能力提升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司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上接第一版

“李会长,您快帮我看看!这封信说我侵权,要我每年交一万元,不然就法院见!”在梅州柚产业协会会长李永生的办公室,梅县区桃尧镇某农场老板张某拿着一封商洽函,急得满头大汗。原来,一家外地公司声称某柚子包装上“梅州金柚”四个字使用的字体,侵犯了其美术作品著作权。

由于包装是外包给广告公司做的,印制的图案和字体张某均没有过问,也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了解。这突如其来的法律风险,让他慌了神。

往年柚企柚农遇到的多为买卖、承包、租赁等传统纠纷,涉知识产权的十分少见,李永生迅速启动“法院+协会”联动解纷机制,第一时间联系梅县区法院。

梅县区法院委派负责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的畚江法庭负责人叶欢来协调处理。

“判断是否侵权的关键在于,字体字体是否构成美术作品。”叶欢第一时间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经过详细调查后,叶欢认为,“梅州金柚”四个字虽然使用了字库中的字形,但从整体上并未形成独特鲜明风格,故该字体因缺乏独创性而不受著作权保护。

法院的释法,让张某悬着的心放下了下来。

“叶法官,多亏你们,我才有信心有理有据和对方沟通,让他们知难而退,避免一场官司。”事后,张某打来电话给叶欢连连道谢。

风波虽平,警钟已响。“这绝不是个案。”梅县区法院在向梅州柚产业协会通报情况时分析道,“随着品牌价值提升,各类‘碰瓷’、假冒、不正当竞争的风险会不断增加,我们必须从行业层面构建保护网。”

梅县区法院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梅州中院经过调研之后发现金柚产业在发展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和法律风险。

很快,一份由梅州中院发出的司法建议书送到了梅州柚产业协会。建议围绕规范地理标志使用,强化金链条品控、构建协同保护机制等提出具体措施。

“法院的司法建议非常及时,切中了当前金柚产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关键堵点和风险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李永生表示,“协会将认真组织会员单位查缺补漏,把建议转化为行业自律的具体规范和行动,持续擦亮梅州金柚这块金字招牌。”

发展之问:驱动传统果业的升级之策

“定金和订金有区别吗?”“微信上谈好的价,对方不认账怎么办?”“在抖音上可以使用别人的金柚素材吗?”……在南福金柚种植基地的观景平台上,一场“‘柚’见法官面对面”柚林法律讲座吸引了周边20多位柚农、合作社负责人和电商主播,大家争相咨询困扰已久的难题。

梅县区法院内村人民法庭负责人陈志雄为旁听讲座的乡亲们耐心阐释道:“在咱们客家话里定金和订金发音不同……”

南福金柚种植基地位于梅县区雁洋镇南福村,是集生产示范、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广东省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

这次涉柚专题讲座由梅县区法院精心组织,围绕柚子买卖、柚园承包、劳务用工等传统纠纷类型和涉知识产权新型纠纷为从业人员“定制”了课程,针对性的合同指引,到电商合规的提醒,再到知识产权布局的建议,将法治的种子精准播撒到产业升级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黄裕亮就是一名“新农人”,既种柚子也卖柚子,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网红柚农“月亮叔叔”,现在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注册自己的商标。法官现场从商标查询、设计申请讲到后续维护,为他规划了清晰的路径。

“以前觉得商标注册麻烦,无从下手。现在总算理清了,‘月亮叔叔’要从网红变品牌了!”黄裕亮高兴地说。

产业的未来,系于持续的创新与升级。当电商直播、乡村旅游、精深加工等新业态融入千年柚乡,梅州法院也主动将服务延伸至产业链的每一个新兴角落。

“柚子是梅州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柚子产业是梅州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重要载体。”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教师丘姗姗表示,梅州法院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纠纷,为金柚链条产业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司法的根系深扎乡土,与产业的脉搏同频共振,一条从“化解纠纷”到“守护品牌”再到“赋能创新”的守护链,便清晰浮现。这不仅是职能的延伸,更是法治生态与特色农业的深度融合。

在这片希望的山野间,法治如阳光雨露,默默滋养着每一株柚树,守护着每一份辛勤耕耘,见证着乡村振兴的梦想开花结果。

编后语

从连绵柚林到百亿品牌,梅州金柚的产业化之路,是广东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生动写照。梅州法院将司法服务精准嵌入金柚全产业链,从化解生产纠纷到守护地理标志品牌,再到为新业态普法,司法服务始终如影随形,成为护航产业稳健前行的“法治引擎”。

梅州法院的探索实践,正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部署的基层司法应答,亦是广东法院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司法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

广东全省法院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融入为人民司法全过程,持续推动司法力量下沉乡村一线。420个人民法庭和789个诉讼服务站、法官联络点扎根南粤大地,近三年审结涉农纠纷2.7万余件,通过前端联动,大量纠纷化解于萌芽。法治课堂直通田间地头,司法建议靶向施策,为乡村特色产业强化了法治支撑,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坚实而温暖的司法力量。

➡上接第一版

聚焦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浦东引领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任务,上海高院商事审判庭作为牵头部门,已连续八年制定并实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方案。

法治护航,久久为功。今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2025年中国企业调查概况报告,涉及“解决商业纠纷”指标的测评点中,上海“法院的独立公正性”和“对法院的认可度”两项指标得分分别为100分和99.98分,达到全球最优水平。

创新涉外法治实践,塑造国际规则“上海标杆”

黄浦潮涌,东海波连。海事司法是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保障。上海法院立足“打造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定位,深入推进海事审判专业化建设,积极打造海事司法标杆。

走进上海海事法院,巨大的电子屏上实时跳动着当前境内外船舶、货物、港口的动态信息。上海海事法院自主研发的航运链全要素智能分析系统实现了船货港“三位一体”的航运链全要素数据分析,为准确查明上海港航运态势乃至海外港口基础事实提供了强大助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置身上海,涉外法治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上海不断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着力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

在全国首部涉外司法专题片《老外讲故事·法治化营商环境》中,一批具有首创性的涉外司法案例与举措,通过国际当事人的视角生动呈现。新加坡律师林健良(Nicholas Lum)在镜头前回忆起作为外国法专家证人参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审理的经历:“当天,高效的在线庭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法官耐心倾听了我长达数百页的证词。”

上海汇聚了超过7万家外资企业,利用

外资规模庞大。为回应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所带来的争议解决需求,2024年12月30日,上海国际商事法庭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上海涉外商事审判工作迈入专业化发展新阶段。

2025年2月13日,法庭敲响成立以来的“第一槌”:合议庭精准适用国际公约,以债权人营业地法律确定利息起算点和利率标准,审结全国首例参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咨询委员会第14号咨询意见确定逾期付款利息标准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截至2025年11月底,法庭已受理涉外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等案件1940余件,涉案总标的额超270亿元,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司法动能。

司法融入基层治理,传递城市法治温度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三楼的圆桌法庭,没有高高的审判台,浅木色的圆桌与淡绿色的座椅围合成一个温暖的圆心。国徽之下,一幅向日葵水彩画静静绽放。这种“圆桌审判”的方式,早已从长宁走向全国,其背后是“教育、感化、挽救”的坚定信念,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不变初心。四十年来,一代代少审人守护的,始终是孩子的未来。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司法理念,具象化地落在每一个案件里。在一起跨国抚养权纠纷中,法国籍的马克与拉脱维亚籍的扎某为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长宁区法院没有简单判决,而是开创性地引入外籍调解员和双语家事观察员。外籍调解员以其文化背景搭建沟通之桥,具备专业心理学知识的观察员则精准评估孩子的心理状态。最终,一份融合中外法律智慧、切实关照孩子成长的调解协议得以达成。而在另一起案件中,父亲庞某以管教为名,殴打女儿致其身心受创、确诊抑郁。法庭旗帜鲜明地将其行为认定为家庭暴力,并据此判决变更抚养关系,让受

伤的孩子得以在母亲身边疗愈。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5年,上海高院将“推进巡回审判在各街镇全覆盖”和“推进诉讼服务在街镇综治中心全覆盖”作为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予以保障落实。

在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与“无讼村”创建示范点,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村里的议事厅成了法院的“巡回法庭”和“普法课堂”。灰瓦白墙的江南水乡景致里,一行普法诗语巧妙融入墙畔攀援的花丛间。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创新打造“奉法客堂间”基层治理运行模式,将诉讼服务、巡回审判、调解指导前移至全区13个街镇的综治中心。在一批量劳务合同纠纷中,法官直接在奉贤区金海街道综治中心介入指导调解,矛盾在“家门口”便得以实质性化解。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面临城乡诉求交织、矛盾类型多元等共性挑战,而上海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创造性融入治理全过程,以全域性创新举措破解治理难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芦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上海高院特约监督员张义民表示。司法既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利剑,也是浸润民生烟火的暖流。

以科技赋能与人才筑基,助力审判工作迈向现代化

政策规划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上海法院聚焦重点领域研发数字化场景,将司法效能融入区域发展大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发涉临港新片区建设的数字化场景,通过数字化场景筛选分析临港新片区企业终本案件,识别存在经营风险的重点企业,累计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推送376家具有经营风险的企业;上海